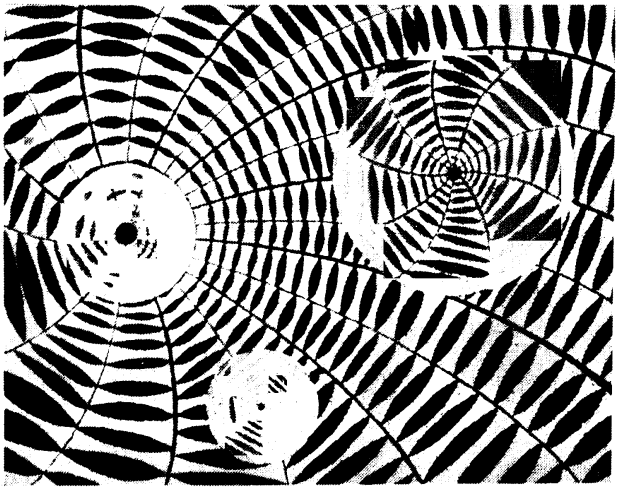

從死胡同裏鑽出來（上）

任致遠著
梁潔芬譯

法國天主教的例子

今年五月十日，法國社會黨總書記米特朗競選成功，榮登法國總統寶座，很多基督徒對這個勝利表示歡迎，其中有些更是黨裏的軍人；他們認爲社會黨可以使法國的政治生活復甦。由此可見人們的態度和社會現況的急劇轉變。三十年前大部份天主教教友會認爲社會黨在大選中得勝將會是國家的災殃，而他們夾在這個矛盾中不禁問道：「若果爲正義而奮鬥之舉是來自左派，而左派人士是指那些反宗教及無神主義者而言，那麼教會豈不是註定要被迫倒退到社會的邊緣嗎？」㈠很幸運，我們從這個死胡同裏開始鑽出來了！左派人士再不是改革的獨力支柱，也不是唯一鼓吹反宗教的人了。現在的政治及宗教生活是可以分開的；一群數量可觀的法國基督徒在不同的生活層面上參與了政治活動，他們以個人的名義去參加左派或右派的各個政黨，從而對其祖國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㈡

對於這個現象的轉化過程，法國基督徒面對很大的衝突和困難。從前，有很多基督徒經歷過軍人粗暴的反神職運動，而就在過去的二百年中，一直把自己放在不利的地位上與政治勢力抗衡，當時路易十六跨台，法國大革命爆發，整個國家被種種錯誤的措施弄得支離破碎，千瘡百孔。以後經過了痛苦的教訓及小心的摸索後，基督徒的生活就能很快的與國民生活依照下列的次序重新整合：㈠與拿破崙簽訂協議；㈡教會轉而支持法國共和政府；㈢政教分離；㈣設立公教進行會及基督徒工會；㈤基督徒進而與納粹主義對抗；㈥二次大戰後，多方面投入政治活動，以及㈦梵諦岡的影响。這個演變的過程是迂迴曲折的，但是，最後我們都能抽絲剝繭的從舊的制度中掙扎出來，進入新的國度裏。

與中國基督徒的比較

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境內的天主教教友發現自己處於與上述雷同的境地，他們也爲着必定要打開這個死結，謹愼而明智地在這信奉馬列無神主義的新中國內踏實前進；可是，問題是如何能使宗教生活合法化呢？這也是一條迂迴曲折的長路；不過，近年來無論在中國境內及天主教會中我們都可以察覺列有些進展的跡象。中國聖公會主教、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及中國基督教教務協會主席丁光訓主教在日前訪問聖神研究中心時說：「在國內，我們得悉天主教會自從在教宗若望廿三世以後便有了很大的轉變，你們國外的一群定必成爲中國的友好而非敵人，我們很希望能保持交談的開放態度。」㈢

無可否認，自從一九四九年解放以來，中國所採取的路綫是踏實的，值得我們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進程中重新檢討。現在就讓我們把它放在國際舞台上去評估吧！

戰後的國際局勢

一九四五年，美蘇二強發生冷戰，因爲兩者都不願意回復到二次大戰前的軍事地位，爲了抗拒反馬克思主義的馬歇爾歐洲經濟援助計劃，她們使歐洲國家分爲兩個陣形。當時，史太林的勢力正如日中天，盛勢逼人；一九四七年九月他組織了共產黨和工人情報局，以聯繫各國共產黨及控制東歐各衞星國家；當時，此等共產國家已經「選出」了自己的政府。親美集團及親蘇集團勢力的形成導致了德國一分爲二，連首都柏林也逃不了被圍牆的分隔，成爲東西兩方的厄運。當時的觀察家認爲，這兩股勢力是無法和平共處的，連交談一事也不曾想像過。

在梵諦岡方面，當時的教宗庇護十二在位，教會的權力全部凝聚在中央；在聖統方面，無論思想上或行動上都顯得非常僵硬，這樣的立場使她與共產主義產生更厲害的衝突。

當蘇聯政府與東正教以及少部份與羅馬有聯繫的教會發生對抗的時候，蘇聯共產黨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沿用至今的反宗教政策，是衆所週知的；可是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天主教信衆才感到它的壓力。在南斯拉夫，狄托總統在宣佈共和政體（一九四五）的前一年，扎格拉布城（Zagreb）主教史蒂伯寧(Stepinac）被捕，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在匈牙利，閔眞蒂樞機(Mindszenty）也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六日被囚，控以叛國通敵的罪名，本應處以死刑，後因他有「懺悔」跡象而改判終身監禁；當時很多教友領袖及司鐸都鄉墻入獄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的總主教伯蘭（Beran）也於四八年二月從自己管轄的教區裏被逐，而在翌年（一九四九）的六月亦成階下囚。這些共產政權盡力使天主教信友與教宗脫離關係，因此上述國家的教會無論在任何階層裏都受到逼害，教友們都處於水深火熱狀態中。他們雖然身在夾縫裏，却對於在理論上與國家政策背道而馳的天主教會表示忠心。他們是眞的走進毫無出路的死胡同裏。

解放時中國的情況

正當國際舞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公演上述戲劇時，在中國方面，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正當舉國歡騰，慶祝這個勝利的當兒，那些小地主、商人及國民黨的擁護者都懷着不少的顧慮；而由於其他的緣故，那些有信仰的佛教徒、道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及天主教徒都在尋找方法以自衞，因爲他們知道中共定必跟她的友好同志——蘇聯一樣，反對一切宗教。這點我們可以試從政教雙方面去瞭解當時的情況：

共產黨爲了實現他們大獲全勝的理想以及推行改革的那份決心，把一個艱鉅的目標放在眼前，就是要帶領全國群衆，展開「第二次長征」。這次長征與第一次長征遭到同樣的艱苦；民衆被派遣去重建新中國，接受共產主義體制，讓共產黨人統一全國。爲毛澤東及他的同志而言，這是一項絕頂艱鉅的挑戰。當時，中國的國土，經過日本人的蹂躪後，一方面要承受大戰後的貧困，還要忍受長年的內戰。國家既積弱如斯，因此新執政的中共領袖要全國上下接納共產主義之餘，一定要號召國人的鼎力合作及多方面的盡量支持，才有可行的餘地。㈣ 一個優秀的馬列主義信徒必須承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不過，中共的領袖對於宗教的不滿，並不止此，他們更爲了下列的緣故去跟信仰宗教者爲難：

1. 在這個新的政治方案將要實施的當兒，全國上下都總動員去貫徹這個目標，只有信教的人除外。據領導人說，因爲他們太沉迷於宗教事務上，以致對革命事業毫不積極，甚至間中有逃避的現象。㈤
2. 共產主義雖然深入人性深處，將明日世界的遠景置諸人前，但仍不被信仰宗教的人接納，因爲他們已經有了宗教信仰及自己對生活的概念，因此對毛主席的召喚，反應並不熱烈；一個人只要一日仍然繼續信仰自己的宗教，他就心有旁騖，甚至因之而減弱其對共產主義的支持。
3. 一些在中國擁有大量信徒的宗教，已經成了有組織的團體，因此他們對新政

策的抗衡是較爲強烈的，更由於這些信徒散居全國，因信徒之間的一致性而更形團結，政府是不易應付的。

4. 信仰宗教人士在祈禱及禮儀上所花費的時間，從經濟的角度看是一種浪費和損失，更因爲舉行上述的祈禱及禮儀而影响到經濟生產的事件屢有所聞，因此使政府更感不滿。
5. 最後要提到的是這些宗教團體本身擁有豐厚的資產，開辦了無數的福利機構及學校；而團體內部的嚴密組織亦對政府的改革方針構成了障礙，無形中，宗教團體與政府形成爲兩種抗衡的力量。他們的存在有利於封建舊社會的延續；而且更偶爾與種種式式的不義之舉拉上關係，因此被視爲人民的公敵。㈥

除了上述對一切宗教不滿的理由外，還有一些是特別加在基督宗教（基督教與天主教）身上的非難：

1. 基督徒是受過特別訓練的，他們學會了如何駁斥幹部的論點，並令他們尷尬萬分；一般受教育不多的地方幹部對信徒們所設的難題往往都是啞口無言。
2. 有些信徒領洗入教的動機是非常實際的，當中有些只是爲了物質利益而領洗入教，例如在饑荒時領取糧食的救濟，在教會機構工作得到升職機會，在教會學校取得學位或在教會醫院裏獲得留醫的機會等。
3. 外籍傳教士們取得中下階層人士們的信任，那麼他們便成爲政府基層幹部的威脅，使幹部難以發揮其影响力。
4. 這些西方傳教士的臨在有利於外資公司的建立，因此，間接增強了共產主義所要揪鬥的目標，被毛主席稱爲半殖民地社會的政治組織。㈦
5. 教會堅拒接受任何一個自稱擁有人類歷史前途的最終答案的政黨。㈧

最後，有些責備是單單指向天主教會的，例如：

1. 天主教徒對自己所懷抱的眞理充滿信心，他們既已落實地納入教會組織及聖統制中，因此，較其他宗教團體所產生的抗拒更形強烈。
2. 天主教修會會士接受外國的指示，特別是梵諦岡的指示，他們屬於國際性修會組織，在共產黨極力加緊締造國家主義的當兒，後者自然會覺得外國的影响力會構成一個威脅。㈨

在天主教會方面，他們往往會不被新政府信任，其中的理由是：

1. 教宗庇護十一世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於「神聖救主通諭」中聲色俱厲地指摘共產主義，並警告全球教友切勿與共產黨員合作。㈩

2. 中國天主教教友很留意東歐共產政府對其國內懷有同一信仰的兄弟姊妹所遭遇的一切，他們早已預料這些情況終有一日會臨到自己頭上。
3. 共產黨希望控制宗教，要使它成爲達到政治目的的得心應手工具，對宗教的特質絕不尊重。
4. 早在「長征」時期，毛澤東對宗教的態度已昭然若揭，因此天主教會對他日後的宗教政策已有如履薄冰之感，而這個時候毛澤東將宗教信仰與信教民衆劃分開來。從毛的觀點看，宗教信仰是意識型態上的問題，只要從政治教育入手，就可以把問題解決。另一方面，毛澤東知道宗教團體有數不清的田產物業，因此他斷定說這是政治上的問題，只有利用暴力才能加以應付，因爲這再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而是群衆及階級敵人之間的矛盾。在理論上，群衆仍然可以信仰宗教，不過，條件是要從宗教領袖及宗教組織中抽離，並接受馬克斯的政治教育。㈩㈠

爲中國信仰宗教人士而言，解放後的日子的確是一段充滿了血淚與辛酸的淒涼歲月，教士們無辜的變成階下囚，接受公審，外籍傳教士被逐，全國上下大舉的囚禁及逼害教徒；基督教方面，也在飽受摧殘之時，其中一部份人士組成了「三自愛國運動」與政府合作，其餘的則被檢控及判刑，繼而瑯璫入獄。㈩㈡

但與基督教相比，天主教團體所遭受的打擊最爲沉重，雖然外籍傳教士已被驅逐出境，然而天主教會的強硬抗拒態度依然不減㈩㈢。致令政教雙方的態度與關係變得強硬而僵化；報章上，間有指摘某幾位主教；而在基層幹部召集的學習小組上，天主教教友要面對很困擾的良心問題，例如：要遵守第四誡去愛國抑或聽從教宗？忠於教會組織抑或福音精神？……最後，政府方面還強迫教會成立「天主教愛國會」，這個組織所帶來的後果就是沒有得到羅馬教廷的批准而擅自祝聖主教，這些行徑把中國政教關係再次引入到死胡同裏去。

今日在中國的教會實況

我們不想在過去的痛苦回憶中徘徊過久，只希望對當時的歷史事實作一個充份而深入的瞭解後，能依照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訓諭去向前展望將來。㈩㈣ 當我們擴闊視野，注意一切希望的標記時，我們一定會對將來抱有希望。

我們深信，雖然我們所能做的是極之有限，然而我們的有限貢獻可以促使雙方產生進一步的了解。無論我們的力量是何等微薄，我們仍願意向前邁進，以達致互相諒解，繼而使大家尊重對方的相異之處以共存。

在解放後的三十年中，中國的教會有相當大的轉變，不能容忍的氣氛已經漸漸減弱；無論困難曾經是多麼的大，在政教之間的某程度上的交談正方興未艾。政教雙方都表現出一點的善意，而這種以緩慢節奏進行的溝通，似乎正指向一個對雙方均屬有利的和平共存境界。

自中共建國三十年之後，政府方面才開始承認他在過去也有犯錯的地方，現在，一段富有彈性的務實政策取代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認爲正統共產思想的左傾路綫㊿㊺，這個修正並不等於廢除了毛澤東思想和馬列的共產主義。

外交政治路綫的改變似乎越來越明顯，自一九五六年以來，中國像某些共產國家一樣，採取了一條與蘇聯有別的獨立路綫，以期走出一條眞正適合中國的路。在五十年代後期，蘇聯的專家撤退後，遺留在中國國土上的是一大堆科技和經濟的問題，更爲中國留下獨立及自主的機會。繼而，中共從竹幕裏冒出頭來，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進入了聯合國，然後北京政府圖謀與西方各國建立密切關係，以平衡蘇聯在全球日益擴張的影响力，她特別着意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此外，更不忘協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以及極力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在內政方面，中國似乎採取了一個爲國內民衆所接納的四個現代化以及其所引致各階層的建設的政策。爲指向這個目標，政府便要利用了種種的刺激以鼓勵大量生產，甚至准許農民保存自留地，以及在自由市場上出售農產品。而最特出的是從西方先進國家中，大量聘請科技專家以圖援助本身的科技發展；此外，更在全國各地發展旅遊事業。近年來，林林總總的外國人湧到中國旅遊，他們之中有國外華僑、富裕的外國人、中國問題專家、曾在中國傳教的傳教士、以及成千上萬的普通遊客。在宗教政策方面，領導人的態度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官方在某些條件下，對宗教有了一定程度的容忍，以致宗教活動的範圍已擴闊到靈性方面去了。

國內外政策的轉變，似乎安定了國內的民衆，而宣傳方面也不再誇大其詞。民衆之間的互相信任亦逐漸增加，而且願意更加開放，會談論一些他們以前不敢涉及的問題。㊿㊻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天主教會也經歷了一次很有關鍵性的變革。在教宗庇護十二世的繼承人若望廿三世宣佈召開大公會議之日開始，天主教會內便產生了徹底的革新。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爲整個教會而言，是一個自我批評及自我反省的行動，其後果到今天仍未能有一個完全的估計。教會內的中國觀察家把這個時期中的一些重要轉變臚列如下：

1. 教會在梵二之前，往往易於指摘與己見不合者；梵二之後，這種態度改善了

，表示願意與一切意見不同而懷有善意的人交談；同時，教會亦謙虛地承認，自己也需要向外學習。在眞正神貧精神下，教會承認自己不是一切眞理的唯一擁有者，而是一個在旅途中團體，不斷尋求上主的旨意。故此，天主子民需要不斷的皈依。㊉㊐

2. 教會固然承認教宗在教會的統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但梵二亦尊重及接納地方教會的獨立性、主教團的權力，不同文化的源流，以至每個地方教會的不同需要。在普世教會內都可以見到一些多元化事物的出現。天主子民在世上的使命較前有了很大的轉變。

3. 基督徒越來越醒覺到他們的言行在政治上的含義，而且近來教會也發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下那欺壓的一面；同時，教會又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共產主義，不再視它爲不能妥協的敵人了。這個在態度上的轉變，導致了基督徒對馬克斯主義有深一層的認識，而且比以前更尊重信友在政治問題上選擇的自由，以及承認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4. 教會已有相當長的時間，明智地與西方權勢保持一段距離，但在「俗化主義」入侵教會、「消費主義」漸漸興起的當兒，梵二教會在西方國家中產生的危機搖撼了西方基督徒團體。富有活力的地方教會慢慢地生長起來，且予人良好的印象。這些充滿了生氣、活力的團體漸漸肯定自己的角色，以擔當更重大的責任。因而，他們在普世教會裏連說話也响亮起來。第三世界的興起，使教會的重點由第一世界轉移到第三世界。在此期間的教會決不是西方所能壟斷的，而發展中國家若願意的話，他們可大有機會與被壓迫的人民結盟。這是天主子民悔改回頭的千載一時之好機會。㊉㊈

好幾年前，人們以爲基督信仰在中國已經滅絕了，誰知道過了不久，又再充滿活力地在各地重新露面。在獄中的基督徒大部份已經被釋放了，他們對教會的忠貞、所產生的影响力，遠及教外；入教的人很多，而年青一輩中，很多都問及有關基督宗教的問題。在海外的聖職人員裏，修士、修女及教友均聯袂探訪國內的教友；經過無數次的接觸，國內的信徒收到若干宗教書籍及聖物，也得悉普世教會的近況，並表示他們在心神上仍然與普世教會緊緊的連結在一起。但是中國教會目前仍然採取四零年代的模式，要趕上現代教會的話，定要下一番工夫。有些教堂開放了，某些被政府接納的主教和神父能履行他們的牧職。至於教友表揚信德的方法有很多，私下的和公開的都有，有的在禮儀中和集體祈禱時宣示；有的在家中聚會；也有的在公共場合舉行禮儀。通常而論，教友反較從前有更大的自

由去表揚信德，也可以說這是天主教會漸漸開放的現象。

依然存在的問題

中國教會已有了若干的改進，但是，它還要應付很多棘手的問題。例如：中國的政教雙方並非踏着同一的步伐向前邁進，結果政府方面的發展以及教會內的神學思想，產生了一段距離。自從毛澤東身故後，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管制又告放鬆，這對全國事務，包括宗教問題在內，產生了實際的影响。無論怎樣，梵二的革新精神應該在大部份的中國教友中表現出來。一個在沙田道風山叢林、做研究中國的朋友說：「在進步的社會制度中，存在着落後的神學。」㈡㈩ 他是指國內天主教會及基督教會而言的，這個例子相信能解釋近日教會演變的落後情況。這只是說明教會有了改進，但仍與普世教會有一段距離，還有很多東西要急起直追。

很多天主教教友處處自衞，已把教會倒退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世代，也許他們沒有得到清晰而明確的指示，因此他們不太願意與政府合作，但是，假若給予機會和方法使他們明白教會所需，繼而潛移默化地接納改革，這樣他們便可有長足的進展。

國內基督徒所享有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與海外人士作意見交流也在限制之列，這在宗教刊物上尤甚，官方並不會常常容忍信仰分享或作證信德，政府只會准許在指定的地區由政府認可的主禮人舉行官方的宗教禮儀。

無可諱言，這種自由是有其本身價值的，無數的天主教教友利用這個機會去參與祭禮，但是他們並不完全滿意這種讓步。文化大革命以後，政府的實踐宗教自由政策所給予人民的印象是猶疑曖昧的，他們雖然曾爲此事而加以辯護，但骨子裏，政府已經決定了宗教活動的地域及其影响的範圍。

事實上，政府的政策亦有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宣佈實施宗教自由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反對愚民政策，同時政府又不斷的指摘宗教是統治階層的愚民工具，並且抱怨說直至現在他們以爲早已清除的上一代的渣滓現在又死灰復燃。㈡㈩㈠

若果政府是在運用方法去對付迷信及宗教的話，他能否說自己尊重信仰，對信仰採取中立態度呢？政府是不是以平等方式和態度對待信仰宗教的人士及無神論者呢？事實上，信仰宗教人士很少有機會在社會裏擔任要職，而其他不信仰宗教公民却享有程度較大的自由。

一向以來，政教關係是難以達致和諧的，在很多情況下，政府干涉宗教事務

，而天主教愛國會成了一個安置在教會頭上的政治組織，藉此政府一方面准許天主教會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亦欲加以控制及約束。這種合法的代價是否太高呢？一些天主教領袖在很多場合下要做政府的發言人，他們能否爲自己講話呢？他們是否可以依照自己的使命忠信地去保存、宣揚和闡釋天主聖道呢？㈡㈩㈡

既然中國官方聲稱他們信奉馬克斯無神論，而宗教信徒對基本的宗教信條不可讓步，所以國內基督徒理應無法接受馬克斯無神論了。當有人問及這點時，丁光訓及鄧以明兩位主教所給予的是同一的答覆：「共產主義與基督信仰是不能相容的。」雖然如此，但學習如何生存及接納異己確是一回重要的事。無論是宗教力量或政治勢力都不應先在哲學層面上摸索，却要首先深入人的深處。一個耐心的交談必能導致有效的研究，改善現況。無論人們抱持着什麽意識形態，起碼要在最基本的事上取得協調，才可以共同建設一個適宜人類居住、充滿和諧生活的社會。

註釋：

㈠ 這個問題是節譯自八一年三月十日，法國天主教日報「十字架」（La Croix ）中，一篇由Vincent Cosmas 所寫的文章——信仰與政治（FAITH AND POLITICS）。

㈡ 現在教會的訓導已有一個突破性的轉變，那是對社會主義的器重。由於世事多變，意識形態不斷湧現，使教會本身亦在演變中。聖座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是由一個全盤譴責它爲一種無神論意識形態（「新事物」通諭一八九一）轉變爲應邀去鑑別及審定它的內涵的心情。（一九七一年保祿六世致雷樞機（CARDINAL ROY ）的信）。

㈢ 見「鼎」第三期，《會晤中國基督徒後的反省》，第八頁。香港。八一年五月卅日。

㈣ 華國鋒主席最近呼籲說，人民要堅持中國的四個基本原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會號召全國人民高舉現代化征途的四項基本原則：①追隨社會主義路綫；②無產階級專政；③擁護共產黨執政；④高舉馬列毛思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屆人大二中全會文獻》，第六十四頁。一九七九年，北京出版。

㈤ CHU VAN 在他的書「成地」中，將《反叛的基督徒》描繪爲自我主義者，他們面對着美國的轟炸所造成的共同威脅，也不肯爲國家奮鬥。《河內。一九七七年四月。青年出版（Honoi，editions Thanh Niem，April 1977 ）》。這本書經E-CHANGES FRANCE-ASIE評核，編入檔案第四十號。

㈥ 此註第一部份所引譯文，由於原著未能在港找到，乃根據法譯爲翻譯標準。「在中華蘇維埃內，一切權力屬於工、農、兵和全體勞動群衆……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及僧侶均屬於剝削階級，是反革命份子，他們是沒有選舉代表、參加蘇維埃及享受自由的權利。」

「中國農村有許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回教寺廟所有的土地。」它們在地主制度下，成了一種剝削。參閱《毛澤東選集》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 124 頁。北京出版。

㈦ 節錄自《雲南廣西邊疆區域第二屆黨會議議決。該議決是由毛澤東同志草議的（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中國衛理會，三自愛國運動先驅吳耀宗在解放前，已經接納了馬克思分析中的許多論點，他造詞強硬，對教會團體寫了一段這樣的文字：「在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它不知不覺地變成一個保守的力量。在目前的世界，它更變成一個反動的力量。基督教在現制度的環境裏，感到溫暖舒服，因爲它的意義和它所宣揚的教義，都是這個環境所孕育出來的……在許多人的心目中，美國已經變成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在這個歷史悲劇的進行當中，基督教不但沒有本着先知的精神提出抗議，反而與這個反動的計劃幾乎完全打成一片……。」《天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上海，第四頁。

㈧ 中國基督徒議會主席、江文漢解釋說：「中國基督徒必須愛國，若然愛國就必須在政府的立場。愛國表示接受在中國，宗教不能超越政治、不能脫離政治的事實。」節譯自《中國與教會》英文版（七九年九月至十二月）。這個解釋對一個基督徒來說是不能接受的，三自愛國運動主席丁光訓主教的意見即有多少差別。他說，「愛國並不等於贊成國家一切的決議；耶穌基督祂愛自己的國家，爲國家的錯誤而難過。」（「鼎」第十六期，第十一頁）。在另一個場合中，他補充說：「對我們來說，愛國首先是要愛新中國。我們對新中國的積極態度是正確而有事實根據的。」（《香港英文電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

(九) 中國遠非一個新興的國家，但當她擺脫了外國的枷鎖時，便與一個新興獨立國家無異。中國經過了一段民族主義很強烈的日子，先是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之後至今，然最強烈的要算在一九四九年，毛之取得政權。在這段民族主義的時日中，對一個新興國家來說，這不單只無法避免，而且是必須的；它更符合了這個國家要與其他國家隔離，以便變得更有信心，更清楚瞭解自己剛剛肩負起的責任，去嘗試行使剛剛採取得來的自由的迫切需要。新的領導人也趁此機會去學習使用權力，申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使人民接受，刺激全國的力量，把它們團結起來。而中國與外界隔離的時間是更長且更嚴格的，因爲毛主席要中國人遠離外國人的影响，這些影响一般來說都是反共的。
附註：傳教士將自己的地區作爲自己的「傳教領域」，而領域內的人口則爲「自己的教友」。這不能不使共產黨的人氣忿。

(十) 特別在第五十八節上見得到。

(十一) （按：此註所引譯文，由於原著未能在港找到，乃以法譯爲翻譯標準）。這段文字裏表現出共產黨在當時的一個重要思想：「屬於宗教機構或廟宇的及一切公共的土地，中國蘇維埃政府應當無條件地歸還給農民；但在處理這些土地時，爲避免損害農民的感情，政府應先徵得農民的自願支持。」（《中華蘇維埃土地法》，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六條。）

(十二) 基督教的外國傳教士比天主教的外國傳教士更早離開中國，因爲「他們的存在，是中國信徒感到羞恥的因由。」（見：Francis Jones "The Church in Communist China"，A Protestant Appraisal，Friendship Press New York，P.49）
即使在開始的時候，一些教會的領導人士熱烈的擁護「三自愛國運動」，但並不是毫無異議的。例如一九五一年五月，有兩位在漢口中華聖經會（China Bible House）工作的教徒被捕，並受到十四位基督徒的指控；衛理會的江長川主教譴責他的同僚陳文淵；而聖公會主教陳見眞也同樣指摘他的同事朱友漁。然而，更有抵抗三自的代表性人物黃明道牧師，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被捕，直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才恢復自由，比他的妻子遲了兩個月才獲釋。（R.C.Bush："Religion in Communist China" Abington Press. Nashville 1970, pp. 187-199）。

(十三) 參閱：J. Lefeuvre：Les Enfant dans La Ville，Casterman Paris 1966。作者解釋上海教友如何與神長團結一致，抵抗政府的攻擊。

(十四) 教宗向中國教友講話，英文原文見Sunday Examiner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七日，中文譯文見同日《公教報》。《公教報》的譯文比台北《恒毅》第三五七期的可靠。《恒毅》月刊譯道：《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赴亞洲牧靈訪問途中給中華民國親愛的兄弟姊妹講話全文》，故此將教宗講話的重大意義縮窄了許多。

(十五) 文革時，流行的口號是「紅勝於專」，意思是：政治意識「紅」比專業知識「黑」更爲重要。後來，鄧小平副總理說了一句有抵觸的話：「不論白貓或黑貓，曉捉老鼠的便是好貓。」中國歷來的實用主義，又再抬頭了。

(十六) 自從馬克斯主義在解釋上有了分歧後，莫斯科不再被視爲典範了，而共產主義亦有了不同程度的推行方式，如從阿爾巴尼亞和一九七五年的柬埔寨的殘暴政權、到南斯拉夫的溫和派；文革後，中國也脫離了強硬的路綫。

(十七) 以下的一段文字是節譯自尼加拉瓜主教團致撒丁尼陣綫（Nicaragua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Sandinista Front，Managua 17/10/1980）的一封信，它顯示出一種新的想法：「我們教友是一個教會，是一個生活的和有歷史的團體；它有人的局限和弱點，但也有上天的力量使我們重生。雖然是罪人，和一般人一樣都會跌倒，但天主的聖神却召喚我們去皈依祂，去投入歷史中改變歷史；我們的弱點可能會使我們蒙羞，但即使在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因着信仰，我們都經歷過奇妙且不可言喻的復甦。

(十八) 在西方，幫助貧窮的人並不是基於慈愛或憐憫之心，而只是因爲他們的赤貧和哭泣搔擾別人。教宗保祿六世在他的「人類發展」通諭第廿六節中描述世界上的不公義，同時譴責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要對這些不公義負責。

(十九) 第三世界可能會成爲中國與教會的橋樑。坦桑尼亞總統Nyerere 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廿四日跟毛主席作官式交談時，並沒有隱瞞他的宗教信仰，他說：「作爲一個基督徒，我體會到在中國領導人的態度上有一種『神聖的不滿』，因爲即使中國領導人對於公義、福利、平等的進度上感到不滿，但政府與人民……總沒有在失望中放棄，我們需要在這方面學習面對……普遍的不滿，並應用到我們的語言和景況中。」
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九日的「人民日報」上，郭偉成在談及拉美時，分析天主教在受壓迫的人中的角色。對於他那有趣的結論，我們姑且引而不評：「這是教會日益『激進』的產物，說明拉丁美洲各國社會進步的潮流畢竟是不可抗拒的。」

(二十) 見《基督徒在中國植根》香港英文「虎報」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二日。

(二十一) 見《如何對青年加強無神論培育》，「光明日報」，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五日。

(二十二) 這並非是對愛國運動成員說出的一句消極語；只是在特殊景況中，需要作出特殊的決定，以挽救可以挽救到的，故此是值得去將這種情形與法國大革命時期與革命政府合作的神父的情形作一比較的。有誰會指摘那些發了誓的人，說他們反對別人呢？把麥子和種子分開並非易事。在這個微妙的問題上，決定性的因素不能放在一些對羅馬毫不妥協的批評或某些神父的婚姻狀態上。我們只想指出，基督教的「三自愛國運動」在一些教會領導人推動下很快便出現了，而天主教的愛國會却是當局放置在主教和領導人身上，藉以作爲交換天主教在中國仍能繼續生存的條件。